

张玺：37岁成为河南省委书记

5

历史纪实



宋国涛著
人民日报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。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；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、建设民主政权、开展土地革命；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战胜艰难险阻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。

本书介绍了彭真、黄敬、林铁、程子华、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委书记的事迹，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，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1927年，毛泽东派人送给谭震林5支枪。1949年，谭震林成为开国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。

河南省委书记 张玺

1949年5月，37岁的张玺走马上任河南省委书记，成为当时新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，也是开国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。

张玺是河北省平乡县人，青年时期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，在校期间，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担任邢台三所学校的团总支书记，成为了邢台学生运动的骨干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爱国群众运动，受北平学潮的影响，张玺率领邢台地区的团组织及共青团员，积极开展反抗日本侵略、查禁日货的爱国宣传活动。

1932年秋，张玺在邢台被捕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，张玺正词严地坚持“抗日无罪”的坚定立场。敌人拿他没办法，不久他被押解到“北平军人反省分院”，即草岚子监狱，坐牢4年多。

草岚子监狱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用来关押“政治犯”的临时看守所，专门关押被北平行营军法处判了刑的政治犯。他们妄图通过感化、诱降等卑劣手段，动摇在押共产党人的信仰，使他们自首叛变，出卖革命。在草岚子监狱中被押的有殷鉴、刘澜涛、安子文、张友清、杨献珍等一大批坚定的共产党员。

张玺入狱后遭遇的第一关，就是经受敌人劝降的考验。敌人放出风声说“家里可来人规劝”，张玺的家人闻讯前来劝说过两次，张玺坚持立场毫不动摇，同时晓之大义，说

服家人把带来给他赎身的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，作为接济难友、坚持狱中斗争和学习的费用。

第二关则是经受酷刑考验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被连续审讯3次，每次都是当面过堂，关独居监房，戴着7斤多重的镣铐，受到残酷折磨。但他抱定为革命而死，死得其所的决心，不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。由于他在狱中表现出宁死不屈、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，极大地鼓舞了狱中难友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威望，193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，成为在监狱里入党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党员之一。

1935年春，草岚子监狱来了3个神秘人物，一个自称是“军法处的法官”，另两个说是“共产党要犯”，后来查明，这3个人是南京派来的国民党宪兵特务。他们冒充法官和犯人，打入“反省分院”内部，掌握了狱中党组织的一些情况，决定将包括张玺在内的12位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和骨干处死。面对死亡，张玺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，决心就义。此时，正值“何梅协定”签定，确定华北五省自治，国民党的势力退出北平，国民党宪兵部队仓皇南撤，张玺和这些冤中难友才幸免于难。

张玺在狱中坚贞不屈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，得到了狱中同志的爱戴，送了他一个亲切的绰号——“小骆驼”，意指他像骆驼一样，身负重托，任劳任怨，一步一步脚印地行进在沙漠里。

1936年秋，张玺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等人营救出狱。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，张玺被派到直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部长，从事地下工作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军迅速南进，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，中华民族面

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。受组织的派遣，张玺来到冀鲁豫边区，并成为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40年4月，张玺担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，不久接任书记。

1941年4月12日，日寇在从内黄到清丰、濮阳、浚县、滑县一带的沙区（亦称黄泛区）内，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毁灭性“扫荡”。时值春末，整个黄泛区风沙弥漫，一片昏黄。日寇以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极其残忍的手段，妄图彻底摧毁沙区，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挤走。张玺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日军对沙区的扫荡是“悲惨之状，目不堪睹”。

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，张玺始终战斗在抗日第一线，带领全区军民“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”，以强烈的民族义愤和阶级感情，经受着抗日战争最黑暗、最艰难、最残酷和最严峻的考验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，冀鲁豫边区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沙区尤其严重。由于长年无雨，田间几乎颗粒无收，百余万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受灾群众纷纷逃向周边的区、县。张玺首先狠抓了正规军的扩大和区、县武装的整顿，以及民兵的发展，使全区保持了一支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，严防敌人在此时刻抢粮。其次，着重抓了救灾工作，发放救济粮款和其他物资，帮助群众度过灾荒，重建家园，并对乘机骚扰之土匪、反动会道门给予打击和镇压，稳定了社会秩序。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的领导下，边区人民硬是在敌人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，顽强地坚持下来了。

1945年8月，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为适应新的形

势，党中央决定，冀鲁豫划归刚成立的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。11月，张玺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。

1946年6月，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。蒋介石以14个师、30余万人的兵力，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以南地区，国民党地方武装、特务和还乡团随后跟进，我黄河以南地区形势严峻。张玺召集区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，由他亲自率领独立旅插入黄河以南敌占区，机动灵活地袭击、歼灭敌人。经过9个月的斗争，控制了黄河以南被敌人占领的70%以上的农村地区，为刘伯承、邓小平所率野战军展开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。

张玺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，动员全区军民全力支援和配合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进行。同时，输送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开辟江淮河汉新解放区。邓小平还风趣地赞扬说，冀鲁豫是个好战场，到处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，走到哪里都有饭吃。

淮海战役胜利后，中原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，原来跨省的各解放区的党的领导体制，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为加强对各省工作的统一领导，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支援大军渡江南下，完成民主改革的重大任务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豫皖苏中央分局和豫西、鄂豫、桐柏区党委，分别成立河南、安徽、湖北省委。

1949年3月，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成立，由李雪峰兼任书记，张玺任副书记。同年5月，张玺正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。时年37岁的张玺走马上任河南省委书记，成为当时新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（另一位是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，两人同为37岁）。

在明德女中，我有许多“明星”同学

8

传奇人生



许燕吉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，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，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：不羨靓果枝头，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，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，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，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，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，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，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和妈妈辗转来到南京，入读金女中无望，好在明德女中的校长同意收下我。

到明德我上初三了，先生把我放到乙班，和初入南开一样，最后一排靠门口挤着我的课桌。朝前一看，同学们的后脑勺有如发型展览，有长辫子、小刷子、短头发、长披肩，还有烫波浪、烫小卷的。花发卡、蝴蝶结、玻璃丝带，各色头绳，真是琳琅满目。我的侧前方是位留着披肩烫发，穿着掐腰西装的同学，正在讲他和男朋友在励志社骑马的经历；另一位身穿旗袍，涂着口红、化着淡妆的同学则说她参加交际舞会的各种步伐。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，而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，顿时感到和这些同学格格不入，陌生极了。孤独也有好处，能专心听课，得100分。

很快学校有了新规定，所有女生头发一律齐耳，脸上不许化妆，周一有国父纪念周会，必须穿蓝色旗袍，其他日子可以穿白衬衫蓝裤子或蓝裙子。郭先生到教室逐个儿检查，有的同学哭起来了，而我觉得美滋滋的，都和我一样了。这时床做好了，我又开始了住读生活。

明德女中是基督教长老会于1885年创立的一所老学校，没有三青团，也不建立童子军，但是有宗教课，有团契组织。教会学校一般政治气氛很淡，校外什么运动，例如声势浩大的“五二〇”反饥饿游行，明德就没人参加。国民党选总统，开国民大会，南京街头彩旗缤纷，国大代表又是打架又是自杀，热闹之至，校园内就没有任何反应。

陈黄丽明校长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的第一期毕业生，留学美国回来后当过母校体育系主任。她参加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，是我国体育教育的老前辈，郭先生是她的学生，还有几位教职员都是体育

系毕业的。由于对体育的重视，明德女中的运动会在南京是最有影响的。开幕式要求全体学生表演团体操，我们练了又练，校长都亲自示范，纠正动作。体育老师叫喜勋，后来是我国艺术体操的创始人。当年她风华正茂，英姿飒爽，光彩照人，站在指挥台上，下面是满操场白衣蓝裤、动作统一的少女们，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记者们把操场围得水泄不通，闪光灯不停地咔嚓响。我们学校的田径项目也是南京的佼佼者，球类更是常胜。

进了明德女中，知道陈立夫、陈果夫的女儿都在本校，和同学们都一样，没什么特殊之处。我们同班的有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的女儿洪媪，国民党中央执委赖慈的女儿赖韵玫，我们都玩在一起，还到她们家去过多次。我们说赖慈是“党棍子”，赖韵玫也不生气。

住读生的床做好后，新生们不分班级都住在一间大宿舍里，由于床位还是不够，凡是姐妹二人的就挤在一张床上。紧挨我床的是于右任的两个女儿：于绵绵和于无名。于绵绵比我大，反比我低一年级；于无名小，上初一。于绵绵穿得讲究，腿上是长筒玻璃袜，于无名穿得和我差不多。她二老吵嘴，原来不是一个母亲生的。于绵绵善于和人交往，我不认得“无”字，她告诉我“无”就是“无”。“无名”是姐妹中最小的，怪名字是她父亲亲自取的。还告诉我，他们是陕西人，讲的是陕西话，有一次还带来全家福给我看，竟和我们的毕业照相仿。中间坐着美髯公于右任，两边坐的足有十来位妇女，于绵绵说都是她的妈妈们；后面站着两排，前面地上坐了一排，全

是她们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、孙子孙女们，还指给我看她的大姐，说50岁了。她讲解时神态自若，似乎有这么庞大的家庭挺光荣的，而我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于右任还是书法家，凡同学拿个本子，或拿张纸求绵绵捎回去的，她都答应，而且星期日准给带回来。我心想，这于右任真没架子，小孩子求字他也给写。

我还去过顾祝同家，是司娘的同乡朱女士带我去的。朱女士是顾家的家庭教师，顾的一个女儿和我同年级，在中大附中上学，我想借她的化学笔记看，就去了一趟。顾家也有好几房夫人，待遇也不同，这位和我同年的穿着也和我一般。朱女士说，顾祝同一概不管子女上学的事，谁有什么能力考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，休想让他去说情上学。和我同年这位大概也属不受宠的一房，知道奋发读书，考上了中大附中，当时也是最难考的学校了。

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我妈妈的中学同学，我称她韩娘。我们到南京不久，她设家宴请我们，由此知道我在明德走读，中午啃馒头。原来卫立煌的小女儿卫道蕴就在明德上学，比我高两级，当下就说好让我每天跟卫道蕴回家吃午饭。

卫家在上海路南海，离明德不远，房子很大，是相连的两幢洋房，闲着一幢，住靠马路的一幢，有花园有车库。饭厅在楼下，长条饭桌，卫立煌坐在顶端，我算客人坐在他下首，韩娘坐我对面，卫道蕴和她姐姐坐我这边，她弟弟卫道然坐韩娘下首。卫道然比我小，在金陵中学上初二。这三位卫“道”各有各的母亲，而且都亡故了。吃饭时这大将军总对我问这问那。有一回问我籍贯，我说

是福建漳州，他就大谈他在漳州打仗的事。我那时哪里知道什么打内战的历史，也不知如何回应，幸而韩娘总给我圆场。妈妈怕我脚长得快，给我买的皮鞋大，不跟脚，走在她家地板上咚咚大响，他就问我是不是错穿哥哥的鞋了，还哈哈大笑。虽然他似乎也没有架子，可我对他总心存畏惧，认为他属于开枪杀人的一类，和我家教书的不同。在他家吃饭还有一点儿不习惯，就是身后总站着一个勤务兵盯着我的碗，我刚吃完，他就上前一步把我的碗夺去，也不管我还要不要，就盛满一碗放到我面前。饭后，我就在两位小姐的房里坐了一会儿，等着卫道蕴叫我一块儿去学校。卫道然不像他的两个姐姐那么内向，常在饭后和勤务兵一起擦洗他的自行车，有说有笑的。

40年后，我出差到北京，特地找到棉花胡同去看韩娘。60年代卫立煌回祖国有韩娘很大的功劳，她一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。韩娘的心脏不好，躺在床上，看到我很高兴，问过我妈妈、七娘的情况，还告诉我她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经历。那时卫立煌已病逝了。我怕她说话太多累，便告辞出来。卫道然在院子里等着我，他还记得我在他家吃饭的事。他谈到他父亲从南京逃到广州，又从广州逃到海外，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，一路艰险，他都保镖在侧。他谦虚地说，他只爱玩枪习武，书念得不深，回来后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，他夫人竟也是明德的校友。两个姐姐去了美国，一个哥哥在广州当教授，不幸为救人自己溺水牺牲了。我们谈了好半天，这次拜访后一年多，韩娘就去世了。

（完）